

臺灣現代化之文化建設與反思

張玉漢博士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總監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兼任助理教授

1、前言

在2025年台灣光復八十週年之際，回顧臺灣現代化之各項發展，可發現在早期行政官僚與知識份子的擘畫及推動下，為台灣打下重要的基礎。因此政治方面朝民主體制發展、經濟方面擁有重要產業並在國際上擁有重要的經濟實力，而社會方面則是來自各地的人民共同落到台灣的土地上，彼此互助，形成了一股特有的臺灣互助人情味。也因此1980年代國際政治經濟情勢動盪飄搖之際，中華民國挺過了種種難關。

在這樣的基礎上進到了近20年，雖然在政治上經歷了總統直選、政黨輪替等人民參與政治並改變政治的結果；經濟上雖然仍遇到貧富落差過大、低薪及無薪假等挑戰，但因國際晶片需求而讓台灣的資本利得收入有一定亮眼的表現，支撐著臺灣資本市場的運作；而相較於政治經濟面向，近20年發展上最可惜的是在社會共融上，可發現臺灣社會已經失去許多理性探討的空間，並且也因為「一窩蜂」的現象，讓許多應該被注意到的面向，在這種浪潮中也容易失去大眾的關注或者僅成為少數有心者追蹤的議題。臺灣社會被長期政治議題選擇的偏激，社會仇恨情緒的動員，讓台灣人民失去了理性討論的空間，許多的議題陷入了兩極，民眾被迫要在生活中表態，並且若非支持A意見，則會被劃為支持B意見，民眾雖看似有許多資訊來源的選擇，但實際上也僅是被動餵食訊息的禁嚮。並且在公共領域的討論，原先彼此可包容不同議題討論，不同可能性的討論，在現今的意見領袖與數位媒體的推播下，也更失去公共領域的角色及重要性。

而在文化藝術領域的部分，則可看到許多文化資產或非物質文化保存的議題，逐漸無人重視。政府在發展文化建設八十年之際，從原先的因應政治、經濟及社會發展的需求，產生許多對策，雖然絕大多數時間看來仍在做補救的動作，但至少顯示出政府意識到文化藝術領域的問題所在。但在近期則可發現，政府在藝術文化政策上，除了以經濟導向外，同步亦將意識形態帶入文化政策中，以補助做為政策工具，資助具有意識形態的藝文項目。例如從近期媒體報載的幾項事件，文化藝術領域的許多從業人員針對立法院員凍刪文化部預算所發出之抗議(要飯說)；影視產業的補助上的許多批評，「零日攻擊」獲文化部台流黑潮計畫補助7131萬；饒舌歌手大支拿補助逾2000萬；中華文化總會在執行任務中成為另一種公關公司；公廣集團營運等議題，皆可看到過度的政治干預痕跡，也是過往文化政策發展過程中，少見之痕跡。

總體來說，文化藝術的展演是「一個社會高度精神文明的表現與生活價值的展示」，因此文化政策應該是在協助或鼓勵這樣的價值展現，因此因應21世紀的世界潮流，文化政策應該是鼓勵多元，保障少數的發展。但近年來，可發現政

府將文化政策視為一種工具而忽視基礎的價值部分，導致在政策執行中產生更多的分歧，導致文化事務之間彼此的斷鍊或爭奪資源，無助凝聚國人共識，甚者也無法作文化傳承的工作。

2、 我國「文化政策」重點之演變概要

前言提及，我國的文化政策早年是因應著國家發展脈動的需求而跟著產出的政策，是非常實務性的政策工具，當然也深深影響每個不同時期的藝術文化領域甚或社會發展，以下就相關文化政策的發展作簡述。

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後，因整體的國家社會環境仍處在軍事優先，故整體的文化政策仍含在教育政策中，尚未見明確推動方向，所有的文化政策皆是為了政權服務，在於發揮文化的政治功能，比發揚中華文化傳統與確保國民黨政權之中原正統。

重要的文化政策主要呈現在幾個重要博物館的設立。如國立歷史博物館(國家歷史文物美術館)創立於1955年12月4日，是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成立的第一個國家級博物館，主要展示自河南博物館遷台的青銅器、銘文及甲骨文等藏品及部分如張大千、藍蔭鼎等畫家作品。同時也參與1959年聖保羅雙年展。另有國立故宮博物院(1965復院)，更加強化中華文化的正統性。

另在1966年時值中國大陸處於「文化大革命」之際，孫科、王雲五、陳立夫等一千五百人聯名上書給行政院，建議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希望政府揭起復興中國文化之旗幟，希望樹立為中國文化承繼者和捍衛者之形象。除了透過各類的鼓勵藝文創作及傳播工作來宣傳中華文化外，也開始從國民生活輔導著手來為中華文化復興扎根。透過文獻可見當時推行《國民生活須知》，訂立包括衣、食、住、行、娛樂等方面之九十九條具體規則，作為國民生活準則。

到了1979年，政府頒布「加強文化及育樂活動方案」，此時可見到國民政府的文化政策已從意識形態的追求或者中華文化正統的追求，則進一步推動到各縣市政府及百姓的需求上，因此各地的文化中心、圖書館、縣市文化基金會等建設相繼完成，也加強了文化資產保護相關法令與概念。此時期正值十大建設期間，面對經濟發展與各項基礎建設施工的過程中，正視到文化資產的保護，相對是重要的文化政策項目。

到了1987年政府「解嚴」，社會的各類思想蓬勃發展，人民的言論、集會與結社功能得以恢復，此時社會的解放迎來更加多元的藝文從業人員的投入，各式的展演、劇場的活動在各地演出，同時也造成很多原本屬於封閉型的公共空間陸續向人民開放。此時政府於1992年推出〈文化藝術獎助條例〉，設立國家藝術基金會(1996年)，以做文化藝術事業的獎補助工作。

而解嚴之後，在政治上很快迎來1996年的總統直選，在地事務的發掘逐漸取代中華文化正統的關懷。而在此間由陳其南教授等人所鼓勵的「社區總體營造政策」，鼓勵所有住民應關懷住所周邊的事物，開始積極參與地方事務，找出地方文

化特色，並盡可能讓地方文化特色形成地方產業，此政策的推動促成許多地方的文化傳統意識，更多的文史工作者關注著自身區域的文史發展故事，傳統技藝的留存，在宜蘭、彰化、雲林等地亦開始有許多私人的地方文化館或產業館相繼成立，並以推動地方文史保存為使命。「社區總體營造政策」的推動，在筆者看來是從「維護中華文化正朔」轉向「各地區域關懷的轉捩點」，在兩岸1990末對抗競爭的時刻，是一股實際的推力，讓兩岸在文化議題上，著實落入不同語境中。

在「社區總體營造」政策後，因應著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亞洲開始向澳洲與英國學習創意產業與文化產業的政策，自此「文化藝術也是一種賺錢的產業」概念影響了政策，政府也陸續推出〈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兩兆雙星計畫」(數位內容)、文化創意產業六大旗艦計畫等。文化創意產業儼然成為國家重要文化政策，導致許多的文化事業被迫面對市場，許多傳統文化傳承的部分，也為了要爭取補助經費，紛紛轉型。

「文化創意產業」之後，政府對於文化政策的關懷落到「文化權利」、「文化公民權」上，故採用「全國文化會議」的方式，鼓勵人民發聲。上述的概述是針對1949年後至2025年間，中華民國政府在不同政權下所生成之文化政策，可見到大致方向的演變。但仍須提醒讀者，其他仍有語言政策、教育課綱調整政策、原住民文化政策、客家族群政策、廣電政策、地方創生等面向，影響整體的文化政策發展甚深，亦須多加關注。

3、從「政治功能」再回「政治功能」的文化治理功能失調

承上，回顧近八十年的臺灣現代化過程中的文化建設，其所對應的文化政策，筆者認為是從「政治功能」開始，進到「社會功能」再來到「經濟功能」，而到最近又回到了「政治功能」。而從「政治功能」再回到「政治功能」的發展，面對著全然不同的政治社會經濟背景，筆者認為是一種文化治理功能的失調，也是一種政府無法打造創作沃土給從業人員的失責。更是導致原本中華文化、臺灣文化甚或各族群文化可以透過臺灣這塊珍貴土地展現更多價值的機會，反而呈現一種單面向、個人性的面貌，無助於大眾願意理解這塊土地上的文化傳承。

早年文化政策的政治功能，主要在爭奪「中華文化正統」的角色，相關的文化政策在於保持正朔、國際宣傳、提升人民生活素質等。另外同時在語言政策上也因為要強化社會溝通及國家團結做了禁止方言，也做了創作審查等政策。從後設的角度來看，對於此時的政府所產出的文化政策具有強烈「政治功能」的原因是可以探查出脈絡。但此時的政策雖然以「政治功能」為主，但幾座重要美術館的成立或復設，是重要的文化建設。

而對於「文化研究」來說，由於「文化」乙詞是指人類在生存過程中，透過學習和傳承所創造出的一切事物的總和，包括語言、文字、風俗習慣、制度、藝術、思想等，是人類智慧的結晶，也是社會價值的體現。具體呈現在具象(建築、工藝)或意識(非物質文化)上。因此「文化」的特殊性、廣泛性及多元性則形塑了「文化研究」學者對於文化議題通常是以「解構」、「宣稱邊陲為核心」甚或「文化轉變」等角度

來進行論證。所以國家發展過程中所面對的文化議題，逐漸去中心化、去政治化甚或針對少數文化權利的保障等，皆是正常的發展。

而這樣的角度來看，政府於1980年代推動「社區總體營造」的文化政策正是符合文化研究對於文化政策發展的發展脈絡。「社區總體營造」鼓勵居民自主、強化社區網絡與關懷在地環境的議題，讓大量的地方史誌、地區特色等在此時期被大量的討論跟保存。這樣的發展雖然是讓文化政策從「政治功能」往「社會功能」發展，但筆者認為亦隱含著部份的「政治功能」需求。因為此時中華民國政府在經歷國際政治經濟的動盪後，在面對兩岸的競合下，如何接地氣的發展下來成了重要的議題，因此文化政策從原本探討中華文化正朔的議題，開始落到在地的關懷。而正是此時期的演變，也讓中華文化傳統的維護逐漸退出文化政策之中。而相繼的教育政策變化，更多元素材的補充使用，在地記錄與關懷等，政策資源逐漸轉而鼓勵大家認識在地，而非上層國族文化。同步的也因為這個轉變，讓台灣社會上在探討中華文化時，成為臺灣眾多文化之一，本質上語言、宗教、傳統節慶、民俗等議題，從中華文化成為了華人文化，甚或激進者則認為就是揉合後的台灣文化。此時期是兩岸對於中華文化認同分歧的重要時刻，也是導致後續兩岸在文化事務推進上，埋下的基礎差異。筆者認為早期有志追求兩岸和平的各界人士認為兩岸間應是「同中尊異」，因此兩岸同文同種有許多的相同之處，更有許多血緣上之關聯，兩岸間的和談，應該在解決政治衝突後，應該是順暢無比。

然筆者認為實際上自1980年代後，「社區總體營造政策」的發展下，兩岸應該要重視的是承認兩岸間雖然有中華文化的淵源，並且有相同語言與文化習慣，但實際上就是存有差異，兩岸人民交往必須要去談差異的部分(生活習慣、價值取向等)，否則反而會因為想像或情懷中的相識感，導致交往後產生更多的衝突，更是導致兩岸產生推力的原因。

在「社區總體營造政策」後，文化政策則走入「經濟功能」，在經濟功能掛帥下，讓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的分際產生了模糊，更因為產業政策具有一定的經濟產值，深獲重視，更加讓需要大量補助的文化事業的預算受到排擠或忽視，經濟功能的掛帥，更讓傳統文化的維持失去話語權，也在主流的政策關懷中消失。

然在「文化是門好生意」的發展下，可發現透過大量補助資源挹注進影視產業、娛樂產業甚或數位內容產業等，希望能與南韓政府一樣「創造台流」，這樣的政策轉變也讓許多投機份子在此取得上下其手的機會，因此可見到如前言所提的資源配置偏頗的新聞，層出不窮的發生，這對於相關領域的發展皆是一種傷害，長期會損壞整個產業的發展或公信力。

4、 掙扎中的中華文化保存

而在發展中的台灣社會，隨著消費者的喜好變遷與政府的不再重視，可見許多原本受到重視甚或保護的中華傳統文化戲曲也逐漸後繼無人，京劇、崑曲等逐漸團隊縮減，演出機會也減少，越來越少學子願意投入學習。兒童讀經班的弟子規、三字經等也因為其強迫背誦，被認為是過時的教育方式。

傳統博物館中對於中華文化的研究、典藏、展示等，也因史觀的不同，被從東亞甚至遠東的觀念來觀看展品。台灣社會對於中華文化的保存似乎僅存於「宗教」與「菜系」上，甚至連「上古神話」也不復見，原本兩岸的漢字文化藝術節也因正簡之爭及孔子學院之爭逐漸失聯，兩岸聯合祭孔的活動也因各自對於祭孔的重視不同，逐漸成為民間團體間的聯誼活動。許多中華文化的傳承，在台灣已略顯無力。

而筆者觀察產生這樣「無力感」的原因在於「與生活失去斷鍊」，無法接觸或無法想像成為直接讓民眾無法產生興趣的原因。另外一個原因在於「圈內人效應」，也就是保存或推廣的過程，無法取得其他民眾的共鳴或者興趣。

因此隨著社會的進步、資訊的多元，要吸引更多觀者的注意成為一種困難的工作。在博物館領域中以「教育推廣」的方式來將展演推廣給更多的民眾參與，但即便以博物館領域中具有實體標的的推廣，也都面臨只能接觸到核心觀眾的三成限制，更何況為更上層的文化傳承及保護。

在台灣的實務中可見「眷村文化保存」正面臨相同的挑戰，也就是台灣獨特的「眷村文化保存」在面對當今的社會發展下，雖然有部分眷村保留下原本基地，但在規劃相關內容時，卻發現難以與其他觀者產生連結。雖然仍有許多學者先進積極對眷村文化保存出力，舉辦研討會、出版雜誌等，但終究所面對的觀者成長能有限。而許多的眷村基地在規劃教育推廣活動時，所談的眷村文化也成為一種附屬，反而商業性、藝術性的活動取代了該訴說的故事。

因此在處簡述當今在文化治理功能失調的狀況下，加上政治意識形態干預了許多討論的可能性，原本屬於文化傳承或者是中華文化傳承的事務將更加困難。

5、 結論

在面對自由貿易下的文化全球化挑戰，明顯的文化政策僅一味的關注在民族文化或在地文化的本位政策議題，似乎已經無法跟上時代甚至科技發展的潮流。文化政策的關懷勢必因為「文化」的特殊性、廣泛性及多元性則形塑了在國家發展過程中，所面對的文化議題，逐漸去中心化、去政治化甚至針對少數文化權利的保障等，這皆是正常的發展。

但吾人必須理解政策是政治資源配置下的結果，因此在關注文化資源分配下，必須要強弱皆視，而不能只挑喜歡的做。否則將會有許多珍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在這樣的選擇下，逐漸退出人民的日常生活中。

另外針對兩岸文化交流與共同中華文化傳統維護的議題，則必須要思考在政治干擾下，如何找出不同的路徑著手，兩岸各有政治需求、亦有思想審查的考慮以及關心的議題，因此該如何找出新的合作模式，則更是可多方嘗試和討論的方向。過往曾經有共編辭典、同推民俗節慶等倡議，但這些合作在政治的干擾下，皆變成統戰議題，而限制住了兩岸交流的可能性。因此未來能否先從軟性

議題著手合作，如文物修復、古蹟保存等議題著手，或許是另一種可往前推進的方向。